



# 中国现代 新诗史

苏智华 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现代新诗史

苏智华 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8 号

中国现代新诗史

苏智华 编著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72 千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5613-0479-X

I·54 定价: 2.10 元

011	.....	有“翡翠潭”“其文则志翁	三
211	.....	有“事嫌其文匪末	四
051	.....	“有底莫色以”“其文夫類	五
251	.....	目	六

(1891—1991) 限氣作 章五第

导 言	.....	1
<b>第一章 尝试期(1917—1920)</b>	.....	2
一、新诗的诞生和新诗运动的形成	.....	5
二、胡适及其“尝试”诗	.....	10
三、刘半农及其无韵诗	.....	13
四、沈尹默、周作人的散文诗	.....	17
五、尝试期诗坛述评	.....	21
<b>第二章 初步繁荣期(1920—1923)</b>	.....	26
一、新诗理论的争鸣和诗坛的初步繁荣	.....	26
二、郭沫若及其《女神》	.....	31
三、冰心、宗白华的小诗	.....	38
四、汪静之及其爱情诗	.....	48
五、朱自清、沈玄庐的长诗	.....	53
六、俞平伯、刘大白的平民诗	.....	58
七、初步繁荣期诗坛述评	.....	66
<b>第三章 徘徊期(1923—1926)</b>	.....	80
一、新诗理论上的困惑和创作上的粗制滥造	.....	80
二、蒋光慈及其政治抒情诗	.....	83
三、李金发及其文言象征诗	.....	87
四、徘徊期诗坛述评	.....	93
<b>第四章 发展期(1926—1932)</b>	.....	96
一、新诗在建格运动和革命诗歌的新成就	.....	96
二、闻一多及其爱国诗	.....	104

三、徐志摩及其“新格律”诗	110
四、朱湘及其叙事诗	115
五、殷夫及其“红色鼓动诗”	120
六、发展期诗坛述评	125

## 第五章 扩展期(1932—1937)

一、“现代”诗派的形成和“诗歌大众化”的倡导	129
二、戴望舒及其中国化的象征诗	133
三、蒲风及其“大众化”诗歌	139
四、艾青及其《大堰河》	142
五、臧克家及其“乡土诗”	145
六、扩展期诗坛述评	148

## 第六章 倾斜期(1937—1942)

一、抗战诗歌运动和“七月”诗派	156
二、田间及其“鼓点诗”	161
三、柯仲平、高兰的朗诵诗	166
四、光未然及其《黄河大合唱》组诗	170
五、何其芳及其《夜歌》	176
六、倾斜期诗坛述评	182

## 第七章 过渡期(1942—1949)

一、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和国统区政治讽刺诗的涌现	189
二、李季、阮章竞的民歌体叙事长诗	193
三、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	200
四、冯至及其“十四行”诗	202
五、过渡期诗坛述评	207

## 结束语

结束语	213
附录	213
附录一	213
附录二	213

## 导 言

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在一个诗国。

在这里，天上的五彩云霞是诗，地上的万朵鲜花是诗；古代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诗，现实生活中的“四化”建设也是诗。

在这里，诗是民族的浩然正气，诗是民性的善良淳朴；诗是大自然的山川流水、雷电网雪，诗是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在这里，东南西北、天涯海角，无处没有诗。

千百年来的诗，写尽了改天换地的壮志和豪情；写尽了耕耘收获的欢快和喜悦；写尽了儿女情长的甜蜜和忧怨；写尽了忍辱负重的悲愤和叹息。激越昂扬的一章又一章，低沉颤抖的一节又一节，组成了诗史。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感情变化发展的历史。

历史在演进，诗歌要发展。那些代代流传的民歌，那些古典诗歌的精萃，以及传统的诗论，都是我们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遗产，是丰腴的土地，是清灵的水，是新时代诗歌诞生和发展必不可缺的根基和泉源。

百家论诗，众说纷纭。《尚书·舜典》上有“诗言志”的说法；《诗大序》中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陆机在《文赋》中对“诗缘情”的解说，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情志”命题的提出，都一致认定，诗具有言志抒情的本体特征。如果从社会功利性价值观的角度来谈诗，那孔子早有定论。《论语·阳货》中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自然是从《诗》而论的，立论有据，针对性也很具体。如果从美

学的角度来谈诗，那袁枚已经提出了审美标准。《随园诗话》中说得很清楚：“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有趣的是白居易论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要是此后中国出现了结构诗学，那就该认定白居易是创始人了。这些古代论诗的精英，都为后世留下了自己对诗的高论。

时代前进了，诗的内容和形式也随之有了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诗的本体特征，就是运用有节奏韵律的语言，艺术地表达人的感情。郭沫若指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这话说得切中要害。真实地表达主观的强烈感情是诗的生命。人的感情产生于社会生活，往往是受到外物的刺激和诱发并借助于外物而抒发成诗的。这也正如《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诗的意境，就是这种主观感情与外物的交融统一。

时代的前进必然影响着人民大众感情的变化。只有诗人的感情与人民大众的感情相一致，并且比人民大众的感情更强烈的时候，诗人才能成为时代的号手，诗才能引起人民大众的思想共鸣。应该说，人民大众对诗人的要求，就是时代对诗的要求。应该说，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标准，必然随着时代的前进得以相应的向更高层次的调整。

中国现代新诗诞生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那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倡导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于是，中国诗歌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明确地划清了新诗与旧诗的界线。新诗在观念上有别于旧诗，从内容上说，它表现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新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说，它是白话语体诗。显然，形式上的变革和内容上的更新是紧密相联系的，白话体适应了当时思想大解放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新诗以生命及其否定和替代旧诗的批判力量。

中国现代新诗植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土壤里。它的诞生和发展、它的繁荣和中落，不能不与社会政治的历史特点相契合。现代新诗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走过了一条崎岖而坎坷的路，并以自己鲜明的时代丰采，展示着勃勃生气和艺术魅力。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由于政治对诗的特殊需要，确立了诗的单一的社会功利性价值判断取向，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匆忙急切的创作心态，难免导致诗的外在形式的滥用和审美惰性的滋长。长此以往，在人们的心目中，诗的本体特征逐渐淡化。

应该说，许多被人们称为“诗”的东西，其实不是诗。

叙事诗的特点是以叙事的方式抒情。叙事诗中可以有故事情节。然而，注重于叙事者，其实是故事而不是叙事诗；注重于抒情者才是叙事诗。

诗剧是抒发多种复杂感情的表现方式。诗剧可以有戏剧冲突。然而，注重于戏剧冲突的故事性者，其实是剧而不是诗剧；注重于抒情的剧才是诗剧。

哲理诗的特点是情与理相通，重在抒情，理寓于情中。然而，诗情不强烈者，其实是哲理而不是哲理诗。

写景诗的特点是触景生情，借景抒情。

诗的语言是有节奏韵律的。诗语言的节奏韵律，是流动的情感在抒发过程中的纪录曲线。这是诗人们追求的高层次的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无韵诗是追求语言的节奏声调与感情的流动合拍而难于顾全韵脚的诗。从这个意义上讲，优秀的散文语言与诗的语言并没有严格的界线；而名符其实的散文诗，即使是诗，也是有缺陷的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诗歌大众化运动的积极倡导，不仅仅是适应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鼓动群众的政治需要，它也体现了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诗歌大众化，应该是思想



感情、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的大众化，而不应把散文化的不良倾向，误认为大众化。大众化，不是一顶桂冠，而是现代新诗的发展方向，是对诗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现代新诗史，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诗的发展史。这门历史学科注重理清新诗理论和创作发展的脉络，并从中发见新诗在广阔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中诞生和成长的内在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研究其性质、特点、发展规律、历史传统，以及各个流派的兴衰、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推动新诗进一步的发展。

新诗不究其，西水南“青”式将国人新途青，街海远  
新诗对言以可中有事途。新诗友式的事途以县点林韵引事途  
诗于重书；青事途县不而事途县突其，青事途于重书，而然。可  
。新事途县水青

突事關款音以可關青。友式原委韵青總紫夏将途式诗县關表  
于重书；原青县不而原县突其，青诗事途韵突事關款于重书，而然  
。原青县水原韵青

然。中诗于离散，新诗于重，原林思已青县款诗韵青原青  
。青原青县不而原青县突其，青然县不青青，而

。新诗景青，新诗景县县及诗韵青景青  
新韵诗县，事韵表诗韵言新青。韵事韵表青青县言新韵青

總思原韵水县高韵来原韵人青县友。幾曲紫原韵中將長式诗青  
原韵青县已關表青韵言青来原县青備沃，新土义意个玄从。具  
青韵文婚韵表升，将土义意个玄从。青韵原韵全颯于數面韵合  
县明，青文婚韵突其替各而，幾原韵青青言青共言青韵青已

。青韵原韵青县也，青  
以不，是青韵原韵原县县众大难青，陳相命華义主正勿確亦  
和由自，要請青原韵众籍原幾麻众籍資婚，众籍青宣丁原县县  
思思县青县，出众大難青，而然。幾然然也原原县良自原青丁原

## 第一章 尝试期

(1917—1920)

### 一、新诗的诞生和新诗运动的形成

中国新诗诞生在《新青年》大张旗鼓地倡导文学革命的时候。它作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

新诗的诞生，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转折时期中，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在诗歌领域里的反映。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人们处在变革的时代，受着时代潮流的冲击。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在思想领域里展开猛烈的反封建斗争。尤其是在1918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渐居于指导地位，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革命，赋予中国诗歌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人们更新诗歌观念，主张“诗体的大解放”，要求新诗表现新思想、新感情和新精神。

新诗的诞生，既得力于思想革命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诗歌途穷求变的历史演进趋势。中国诗歌从风谣体到骚赋体，又从“五七言”古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到曲，几经变化而

到了近代。旧格律曾经把中国诗歌推进到成就辉煌的发展峰巅，尔后又禁锢着诗人的思想，阻碍着诗歌进一步的发展。近代诗人黄遵宪在旧格律走向衰落的时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然而社会影响不大，收效甚微。现代新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接着近代“诗界革命”的种种努力，借助于当时国语教育普及发展的浩荡声势，以白话语体的形式，披荆斩棘，闯出了一条发展前进的道路。

新诗诞生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时代新潮中。新诗的出现和新诗运动的形成，不仅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联系，而且借鉴了日、英、美、法“诗国底大革命”的历史经验。那些在国外留学的诗歌爱好者和国内的文学翻译家，首先从诗歌观念上摆脱旧体诗的束缚，开始了新诗创作的尝试。他们从外国诗歌的体式、音节、手法等方面汲取了丰富新诗的宝贵营养。

中国新诗诞生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它在崎岖坎坷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了艰难行进的足迹。

在文学革命中，最先出现的新诗，是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刊载胡适的《朋友》等8首白话诗。这些诗，以白话替代文言，在语言上与旧诗有了明显的区别；但在内容上，却没有表现出不同于旧诗的鲜明特点，而且在体式结构和音节上也没有摆脱旧体的束缚。这是新诗创作的尝试，虽然算不得成功，但表现出了开拓者急进探索的勇气。由于当时的文学革命，正集中火力批判封建旧文学，人们还没有充裕的时间着手于新文学的建设，因而这些早产的新诗，在社会心理普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关注和广泛的响应。这一年中，刊载新诗的杂志只有《新青年》，发表新诗的也仅有胡适。

胡适尝试创作的新诗，体现了他“改良文学”的思想。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此

“八事”并非改良诗歌的专论，而且也并非胡适的创造，前人早已多次提及过，但它体现了胡适“做白话诗”的主张。他说：“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创作的新诗，也正是他的新诗主张在创作中大胆尝试的成果。

刘半农在新诗的理论建设方面有开拓之功。他最先提出了诗歌改革的具体意见。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论述了诗歌的改良问题。他认为：“诗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所受的束缚愈甚，诗学决无发达之望。”基于这种认识，他从音韵学角度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的主张；同时又提出了“增多诗体”的设想，即“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他的主张和设想，大胆地摆脱了旧格律的枷锁，对于新诗的创作尝试和成长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诗运动的形成，始于1918年。1月，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共同发表9首白话诗，揭开了初期新诗运动的序幕。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引导人们从批判旧文学转向建设新文学。此后，尝试写作新诗的人日渐增多，逐渐聚集起以《新青年》杂志的新诗园地为中心的诗人群。这一年中，胡适的《人力车夫》等诗已从旧诗躯壳中脱出，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刘半农着力于把自己的新诗主张和设想付诸创作实践。他的第一首无韵诗《卖萝卜人》和其后的《大风》，以及散文诗《三弦》等诗作，是他为开拓新诗题材，为探索自由诗、民歌体诗和散文诗的创作道路所做的贡献。鲁迅的《梦》《爱之神》和《桃花》等诗对新诗形成新的诗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表的新诗尽管数量不多，但新诗借助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崇高威望而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在美国留学的陈衡哲，成为现代最早尝试创作并发表新诗的女诗人。

早在周作人1918年12月在同时发表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口号，倡导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文学。这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思想相联系，对当时表现个性解放和表现社会人生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周作人的第一首诗是1919年2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小河》。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说：“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其实，这首诗在内容上表现的“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实在是很旧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它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得到人们的偏爱，就在于它是“五四”以前新诗中最长的一首，而且完全摆脱了旧格律的束缚，采用了白话散文的表现形式。

1919年，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郭沫若、宗白华、郑振铎、朱自清等接踵步入新诗坛。《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刊物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都开辟了新诗园地，并形成了自己的诗人群。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也都发表了大量新诗。仅北社编的1919年《新诗年选》中，就选入40位诗人的90首新诗。足见，初期的新诗运动已经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创作队伍和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鲁迅1919年4月16日写给《新潮》编者的信中说，当时的新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而“以诗说理”的风气也还比较普遍。这也正是新诗在尝试期从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从创作心理学角度讲，尝试创作新诗，总要有所遵循。而诗人们在否定旧体格律以后，便容易出现无所适从的心态。在以白话替代文言的前提下，经过创新路子的选择判断，出现了两种取向。一部分人自觉不自觉地在旧诗基础上发展新诗。他们的新诗从旧诗中脱胎出来，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另一部分人则把触角伸向外国诗，接受外国自由诗的影响，文法上走上欧化一路。这两种情形都表现出，初期新诗在形式上的“模

仿”痕迹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古典诗歌长于写景、叙事的传统，在诗人的新诗观念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于是，一个人写景，都跟着写景；一个人叙事，都跟着叙事。这类诗自然会多一些。同时，尽管人们在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中容易激发热情，但这种热情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容易把握，也就不容易抒发成诗。因而抒情诗少。而“以诗说理”的风气，又恰好与这种热情的冷却与升华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有一部分新诗取材于现实人生，表现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尖锐的阶级对立，对劳动群众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体现了变革时代崭新的思想特色。

这一年10月，胡适应约为《星期评论》撰写《谈新诗》。在这篇长文中，他回顾了新诗在创作尝试期成长的短暂历程，进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新诗见解和主张。他指出，新诗运动是从“诗体的大解放”开始的。新诗要表现反封建的“新内容”和“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新精神”，就“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他重申“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说到新诗的音节，他认为全靠“语气的自然节奏”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只要“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说到新诗写作的方法，他认为，“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胡适受中国诗歌传统的写实手法影响很深，主张“写实”而“不重想象”。这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篇文章是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新诗论。尽管它在新诗形式上过“自由”的立论，直接影响着自由体新诗的发展趋向，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它在否定旧诗格律，促进初期新诗运动的发展这一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茅盾称它是新诗初期的“一根大柱”；朱自清则誉之为新诗理论的“金科玉律”。

## 二、胡适及其“尝试”诗

胡适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的人，也是中国现代最先发表新诗的人。

他原名洪骅，字适之。笔名有期自胜生、铁儿、天风、希强、藏晖等。祖籍安徽省绩溪县龙井乡。胡适 1891 年 12 月 17 日出生于上海。1910 年留学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先学习农业，后改读文科，1914 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15 年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17 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6 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28 年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0 年任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1935 年当选为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1938 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45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 年赴美国讲学，1958 年 4 月由美国到台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 年 2 月 25 日因心脏病发，卒于台北市。

早在 1915 年 9 月，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一首答词中，提出了“诗国革命”的口号和“作诗如作文”的设想。1916 年夏天，他已经开始试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他在《〈尝试集〉自序》中说：“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1917 年 2 月，在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胡适发表《白话诗八首》，揭开了中国现代新诗史的第一页。

这八首诗，是胡适按照自己假定的新诗标准试作出来的。当时，他远在异国他乡，既有“单枪匹马”试作的勇气，也有“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的苦衷。由于他竭力主张白话入诗，因此使用白话把自己的苦衷真切地写进最初试作的新诗《朋友》中：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太孤单”了。胡适说：“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太寂寞了。而《朋友》这首诗正是表现了作者这“一种寂寞的难受”（胡适《逼上梁山》）。这是一首有真情实感的诗，但在体式结构上，没有摆脱旧诗的束缚，采用了五言诗的躯壳。其他几首诗不是五言就是七言，虽说平仄不论已不像旧诗，但其中有些诗句却拗口难读，并未显出白话的长处。开拓创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胡适说：“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可见开头之难。

胡适回国以后，认识到自己在美国尝试创作的所谓“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在他看来，就是仍沿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主张“诗体的大解放”，决心“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1918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人力车夫》和后来收入《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就是胡适尝试“诗体的大解放”的成果。

在这类诗中，《人力车夫》很有代表性：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

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

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



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像这首诗，其字数、句数、体式结构、音节变化等果然都不同于旧诗，可以说它比较充分地体现出了胡适“诗体的大解放”的主张。问题在于，它没有诗情，平铺直叙。它虽然被看作诗，而实际上却不是诗。尽管它是采用诗的形式分行排列的，但节奏感差，语气不自然，音节也不够和谐。可以说，它是散文的内容，散文的形式。

当然，节奏感比较强、语气比较自然、音节也比较和谐的诗是有的。比如《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诗中勾勒出一幅白鸽戏青天的生动画面，清新秀丽！极目仰望，心旷神怡，别有一番情趣。意境美，语言也不错。很显然，这首诗在体式结构和语言上，借助了词的长处。由此可见，从旧体诗或词或曲中取其所长，为新诗所用，这对于新诗的创新发展是有益处的。

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说，《关不住了》这首译诗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这首诗译于1919年2月。全诗共三节，每节四行。各节中二、四行押韵。胡适在译的过程中得到启发，有所领悟。此后，他也尝试创作这种体式结构的诗，收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比如，1919年12月，他为北京《国民公报》被封、主笔孙儿伊被捕一事写了《一颗遭劫的星》。这首诗共五节，每节四行，显得匀称；各节二、四行押韵，语气也自然，音节也和